

为内心纯净的自留地而吟唱

——读杨方的《澳大利亚舅舅》 □贺绍俊

杨方一定有发达的感觉器官，她对色彩、声音、气味都有非常敏锐的感受力，不仅如此，她的内感觉同样也很发达，我所说的内感觉是一种对语言的感受力。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会造就出色香味俱佳的文字。我读她的小说，首先被她的文字所打动。发表在《青年文学》2021年第9期的《澳大利亚舅舅》，写的不过是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来往中的酸甜苦辣，却因为杨方敏锐的观察和生动的文字将其叙述得活色生香。她用蓝色装饰她的羊毛胡同：“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在这里，蓝色的层次也太丰富了些，我不知道油画家能否准确描述出什么样的蓝属于“更蓝”。在新疆长大的杨方在小说中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新疆的感情，她声称她住的地方叫蓝，显然她眼中的蓝已经不是纯粹自然的色彩了，它浸透了阳光照耀下的炫丽，也混合着伤感和安静的情调。小说的叙述便在蓝色的调子中缓缓铺开。



没想到她在小说里写了那么多的人物，她有八个舅舅哦！舅舅们就像走马灯似地纷至沓来，但这似乎正是小说所追求的效果，人物的频繁出场宛如生活中一朵朵欢腾的浪花，他们嬉闹、拌嘴，也相互帮衬和牵挂，虽然这日子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东西，但他们乐享其中。杨方在回忆过去岁月的美好时，诗人的气质就不期然地流露了出来，写到八舅舅夜夜捣麻雀窝时，便有了这样的句子：“月亮冷得白里泛蓝，散发出冰柱一样的光芒，整个世界都被冻得嘎嘎脆。”写到母亲苏梅兰在院子里种下啤酒花时，便有了这样的句子：“铃铛一样的啤酒花一嘟噜一嘟噜地悬挂着，散发着苦味的芬芳，黄昏，苦味会变得更浓。”岁月不仅将杨方塑造成了诗人，也让她朝着哲学家的路上走去。是的，这篇看似只是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我们和舅舅们这几十年来来的交往故事的小说里，其实包含着对于时间的哲思。类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我们走出房屋，发现四十年的时间就像这条胡同一样长，没有拐弯地一下子就走走到了底。”“时间把那些砾人的东西都抹平了，犹如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些美好如金子东西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因此尽管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众多的人物，但不能忽略这些人物的背后都有时间这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他们的行动，时间带来了变化，社会在变，人的容貌在变，人的心情也在变。谁也阻拦不了时间的流逝，谁也阻拦不了时间流逝中的变化。杨方只是感叹这变化来

得太快太突兀。对于羊毛胡同的普通人家而言，最大的变化是从澳大利亚开始的。舅舅们一家决定移民去澳大利亚。当苏梅兰把这个惊人消息带回家时，就意味着大家不再是在羊毛胡同里悠闲地散着步，而是站到一条澳大利亚的跑道上不停息地奔跑了。杨方似乎要对变化作一个伦理上的评估，在她看来，变化太快，既不利于善，也不利于美。她留恋往日时光，因为“那时候的一切都是慢吞吞的，太阳从胡同的这一头移动到那一头慢吞吞的。”她由衷地赞叹那些不被时间拽着拼命往前奔跑的人，比如二舅舅还像住在羊毛胡同那样用维吾尔语汉语随时切换的方式说话，她就赞叹“二舅舅的语调明显带着20世纪的味道”。比如她写父亲坚持搬回羊毛胡同生活后，不仅身上的疾病症状消失了，还把院子里的花草打理得“少女一样开得花团锦簇。”

八舅舅和胡桃才是众多人物中的核心。他们俩在羊毛胡同同时相爱了，他们俩的爱情贯穿小说的始终。当他们相爱时，一切是那么美好。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地像模像样地谈恋爱，他们的恋爱完全融入到羊毛胡同的日常生活中，它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瓢有甜味的水，就让它生活中自然生长吧，也许就结出一个浪漫的果子。但是澳大利亚阻止了这个浪漫果子的生长。从此胡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八舅舅在澳大利亚也失去了他在羊毛胡同时的睿智，变得魂不守舍。最终八舅舅还得回到羊毛胡同，他回来以后，爱情也回来了，诗意也回来了：“胡桃和八舅舅坐在月光里，月光让他们看上去像以前一样年轻。”但是，哲思的杨方战胜了诗意的杨方，因为她知道，时间不会为了诗意而停顿下来，也不会为了爱情而回溯到过去。

八舅舅曾在葡萄园里得到了一本《西域毒草大全》，它成为八舅舅与胡桃相爱的媒介。当八舅舅要去澳大利亚时，将这本书交给了胡桃，托她还给葡萄园的老汉。不妨将《西域毒草大全》看成是一个隐喻，它暗示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各种毒草所伤害。在胡桃的心目中，八舅舅是她内心里保留的最后一点没有受伤害的东西，这是她的一块“纯净的自留地”。杨方是不是要借八舅舅和胡桃的爱情故事告诉人们，要有一本自己的“毒草大全”，这样才能保护好内心的一块纯净的自留地，也才能拥有美好的爱情。

作者要有系统、科学、正确的生态观。生态文学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生态文学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对人的观念、情感、思想行为的干预，让人们更好地处理人类和生态之间的关系。

作家许晨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我们由此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如今，“海洋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东台条子泥是鸟类的栖息地、中转地，候鸟从东亚到北美、大洋洲往来迁徙。哪个地方自然环境好，就到哪里去。我们要以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创建为契机，认真创作文学作品，宣传海洋城市盐城，宣传盐城的海洋生态。

生态文学是开放的叙事

评论家汪政认为，生态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什么是生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实现？生态和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文学如何书写生态问题？这些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包括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设想和人类文明所提供的有限背景当中，作出有限的思考。“生态”不仅仅是作为内容的“生态”，更是作为方法的“生态”。在生态报告文学书写中，要把生态作为一个方案，追求它的多样性、丰富性。只有这样，生态报告文学发展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广阔。

评论家王晖认为，生态报告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还是一个系统问题，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话题非常宏大。优秀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中应该有反思性，它绝不仅仅是科学报告，还应该有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有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和批判。

评论家傅逸尘说，生态问题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生态保护绝非含情脉脉的美好，过程非常残酷、惊心动魄。宝贵的生存权、发展权非常重要，尽管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对生态文学家的思想、眼光和知识，是非常特别的考验。生态文学创作不一定非得强调动物或植物的视角不可。在生态保护、生态重建的进程中，许多人也遭受伤害，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同样值得去关注和思考。中国的生态文学要打破固化的思维，要有一种整体、宏阔的认知，要有历史性的眼光，要有更广阔视野和格局。

《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佟鑫说，一种文体的自立，不仅需要创作上的实践，也需要有理论的伴行、提升。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许多作家、评论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了真知灼见，相信可以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推动生态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的再发展、再繁荣。

盐阜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强说，《盐阜大众报》作为中共盐城市委机关报，要在传承红色基因、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等方面讲好盐城故事。

马克思说：“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生态观，应该是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和諧。研讨会末尾，丁晓原总结道，这次研讨会两个关键词：生态观、生态报告文学。对于新时代的我们而言，和谐生态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徐向林）

刘笑伟的诗集《岁月青铜》，是《诗刊》社推出的“新时代诗库”的第一本，“新时代诗库”致力于打造主题诗集系列，区别以往的种种诗系。《岁月青铜》能够入选，分量可见一斑。在新时代诗歌中，刘笑伟以军旅诗歌的特点突出，风格鲜明。但军旅诗歌，在和平时代，在一般人印象中，似乎有些显得疏远。

翻阅《岁月青铜》这本诗集，给我的整体感受是，有一种粗犷又不失精巧的碰撞感，这种碰撞感来自于作者在面对不同创作对象时在笔触的参差。我们会先看到作者刘笑伟用坚硬如青铜般的文字书写新时代军人的英挺和刚硬，各种现代化的兵种、各种新式武器繁复地铺陈在眼前；之后随着阅读的推进，看到他紧绷的笔触逐渐放缓，用轻松自如的语调给我们说起了军人的故事，原来再精准的武器背后站着的也是血肉之躯，原来再坚硬的战士也会用长满茧花的手指去温柔地触碰细雪。在一进一退参差的风格中呈现出的碰撞感正是这本诗集的独特之处，因为我们先看到他书写军人临敌不乱的坚硬，之后看到他书写战士触碰细雪的瞬间的温柔，才更加令人动容。

评论家朱向前曾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将我国当代军旅文学按“四次浪潮”划分为四个重要的创作分期：第一次浪潮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整个50年代由亲历战争的作者们创作出的反映真实的残酷战争的军旅文学；第二次浪潮是60年代初期以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为契机涌现出的一大批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代表；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呈现出整体的繁荣，各种文体体裁的军旅文学作品被大量创作出来，在这一阶段涌现出的优秀军旅诗歌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等。第四次浪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自90年代滥觞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军旅诗歌作品有李松涛的《黄之河》、康桥的《征途》、辛茹的《火箭箭》、贾卫国的《天弦惊》、王久辛的《狂雪》等。

由此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军旅生活作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始终是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应运而生的，最开始的军旅文学承担着统一思想、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任务，在内容里一定程度上有着对固定题材的持续性书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题写作”的倾向。

刘笑伟在《岁月青铜》的创作中继承了军旅文学历经“四次浪潮”而沿袭下的铿锵劲旅诗风，大部分作品都以军旅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行笔始终沿着军旅生活的脉络展开；同时也有他自己的新开掘，自觉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见微知著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与生活，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题材上、内容上和表达上的新探索。正如他自己在后面的创作谈里提到，他在眼下创作中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在传承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同时，直面时代变革，在创作上能达到一种引领。

所以，在《岁月青铜》里，我们能看到刘笑伟尝试从大的创作主题模式中走出来，将着眼点放置于军人生活的细节化题材里，关注在不同岗位、从事着不同工作的军人们的不同侧面，为读者们展示

《岁月青铜》：从军绿色的坚硬中生出岁月的柔软

□曹子英



写了一块军绿色的原石的不同截面，每一处截面都有每一处截面的璀璨之处。他在《描红》里，写一名花了五天五夜时间用红色颜料笔将祖国海防线界碑上的字描红的普通中国士兵；在《雪线巡逻》中，写在端午佳节之际，一名在高原雪线上巡逻的士兵仍然坚守岗位，在寒冷的雨雪中啃下一口冰冷的粽子；在《最鲜艳的红色——写给王继才、王仕花夫妇》里，

写了以海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将青春献给我国海防事业的一对夫妇，并向他们致敬。他在创作里更加关注在不同军旅生活场景下的军人们面对个人小我及保家卫国的冲突时如何选择、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他笔下的军人不是大英雄，更像是在我们身边很常见的普通人。在《渐渐地、军装与我的皮肤融为一体》《军被，此生最温暖的被子》《手榴弹》《齐步走》《拉歌》《被装队列》这些写日常军旅生活的作品里，他用“布满针脚的军装”“新兵叠出馒头一样的军被”“有益和黄金的军歌”“幽默的手指般的手榴弹”“可爱的黄色小脸盆”和“幽默的不锈钢水杯”这些贴近现实的生活细节和修辞，从朴素的生活细节中挖掘出新色彩。也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军营生活气息，重新了解当代军人风貌。

一直以来，大家印象中的军旅生活都是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要面临枪林弹雨和出生入死，在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冲突性，这一冲突性让军旅题材作品本身就具备了故事性。而如何在诗歌有限的篇幅和合理的结构中表现这些带有故事性的军旅生活，是有一定挑战的。刘笑伟在创作中用简练的话语，以新的方式来表现军人身处当下现实和历史的尝试，如他在《一天四季》里用一天的时间纵向的叙述，总结出一个个边防老兵的一生。在《我的军旅诗》里，他用大量重复句式的叠加，推进情感的层层延续，在诗歌意境的塑造中把握了诗歌本身应有的节奏感，实现了一种在军旅题材下进行抒情表达的有益的尝试。但在整本诗集中，有这样尝试的作品还只是占了很小的篇幅，期待他今后有更多的尝试。

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创作要如何传承过往经验的同时，既不落窠臼又不脱离时代，直面社会变革的新发展；如何从宏大的主题中写出具体的军人情怀，并留出对当下反思的空间；如何从军人的生活小事中见到新时代的军人精神，用诗歌来讲好新时代军队故事；对于军旅诗人来说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岁月青铜》这本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诗集迎下了这份挑战。一方面，它让读者感受到了新时代我们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硝烟与红旗都有了长河落日的余味。另一方面，其在语言、修辞和题材上展开的探索，为军旅诗歌创作拓展出了新的空间；里面丰富的新题材和富有新时代感的新内容让我们看到了军旅诗歌发展的更多可能。

三个“我”的交响诗

——评吉尔《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 □王敏韦莎

《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是新疆诗人吉尔20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在诗集中吉尔将对自我、逝去亲人、广袤疆土的爱贯穿始终。借此，吉尔在性别身份与专业身份的对峙走向“和解”；在感悟当下与回顾历史时，给予那些与命运不断抗争的个体生命以赞美。质言之，诗篇的背后是吉尔对自我、对地域及对世界的深沉的爱。

从诗集《世界知道我们》(2014)到《我从未与世界如此和解》(2021)，吉尔从“我”“我们”“地域”走向了“人们”“世界”，给予“新边塞诗”的豪迈以新意，进而叙述她对自我身份的思索，对新疆绿洲的“小我”体悟以及“大我”对世界之博爱的“天下观”，最终通过质朴直率的诗语呈现出来。

自我的身份之思

“身份”之义，旨在界定个体在特定情境中是“谁”，将其与他人区别开。现实之复杂使人类个体具有多种身份。吉尔既是吉尔，也是诗人，“诗人”不仅是身份标签，也是她诗歌情感投射的对象。据此，她将“自我”情感和“诗人”身份糅合，构成她诗歌的独特特质。

一则，吉尔意识到自己处于身份区分的困境中，并直陈自己的身份宣言。《悖论》中，就大众关注她诗作的性别胜过其文学性，吉尔表明无奈与抗拒：“请不要怜悯我，不要说到性别，孤独。”性别身份与专业身份的调和对女诗人而言，一直是个挑战。这种挑战若获准，会忽视对女诗人诗歌的诗性观照，导致诗评的偏离，也会对女诗人诗歌建设产生误解，使吉尔在建构身份时陷入困境，如其所言，“我坠入诗人的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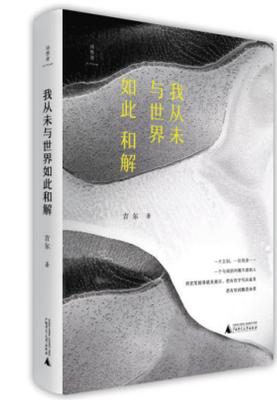
二则，吉尔要达到与自我的“和解”，则要拨开迷雾，解宿命之毒。《楼兰》中，楼兰是“有毒的少女”以暗示“我”的苦痛；“我”中毒极深却不放弃抗争，昭示“自我”的冲突与撕扯。吉尔以女诗人的声音去审视自我，而不进行取舍：“她写得越来越慢，直到多种身份在她身上和解。”在文字“呐喊”中两种身份终得以和解。这是吉尔袒露情怀的“真实性”书写。

总之，在诗人身份建构中，吉尔在专业身份和性别身份间进行回望，她舍弃“非此即彼”的撕裂，坚持自我书写和个性表达，使两者由分野走向和解而得以融合。

“小我”的地域之情

以“新边塞诗”阳刚之气为基，吉尔开拓出私人语调的表达，这反映她对内心的关注，用“小我”抒情凸显主体在场，这可视作她对“诗缘情”的一种选择。

首先，吉尔通过叩问诗人身份、与亲友就生存展开隔空对话，表露她对绿洲“老乡”的爱与怜。吉尔在“与词语纠缠”中找到生命真谛；向逝去的母亲倾诉，阐发她对母亲深沉的爱；写下



大姐的苦，写下怜惜与悲伤。与各色人物对话，使她完成对自我、对亲友、对绿洲地域的抒怀，以“小我”的细腻与悲悯，赋予新疆汉语诗歌创作以新的情感体验。

其次，吉尔对绿洲风景的构成要素如洞窟、峡谷等深描，诉说对绿洲文化的熟稔和深情厚爱。诗中，石林有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向上；赛里木湖像母亲般和“我们”共同生活；青格里给予“我”战胜悲伤的勇气。这些富有绿洲地域特点的意象是对她的新疆生活“在己为情”的言说。

最后，诗中有多次提到绿洲文化遗存，这反映吉尔对新疆文化如数家珍。譬如诗人对小河墓地的无字墓碑的敬畏；在《雨中拜谒细君墓》中对细君公主的“共情”；在《穿越》中对佛寺遗址的敬意。这些历史遗址“掠影式”地呈现，表现吉尔对新疆历史文化的追思。

“大我”的天下观

《庄子》云：“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指平等地爱世人，即“兼济天下”的“天下观”。需要指出的是，吉尔诗中“天下大我”与“地域小我”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生共荣。“小我”的乡愁是诗情源泉，“大我”的时代胸怀是提升诗蕴的助推器。如沈苇所说，吉尔已越过一个台阶，希望她能更好地将“地域之恋”与“世界之爱”融合。

从诗歌题材来看，较多诗篇内容关注底层老百姓，让读者感受沉甸甸的爱。如“我”与捡废品的王大嫂聊天时不敢提及“命”；向早起的人致敬；喟叹瘫痪儿的坚强。诗中“牛羊踏起的烟尘是神圣的”，可见吉尔的爱何其辽阔。吉尔由个人“言情”到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精神追求，使其诗具有“血肉”质地。

从诗歌时空跨度来看，诗中的“世界”是儿女情感的小世界，也是体悟人类生命的大世界。就空间而言，吉尔涉足不同地域：在电兹叹历史之重，在喀纳斯听图瓦人的孤独，在涠洲岛想起故乡。就时间而言，古今杂糅以至同一：“我”目睹北疆遗址时慨叹时间飞逝，在德令哈夜里想起海子，吹着福建海风忆起故乡。远近交融，古今同一，其间流动的是她对大世界的热爱。

吉尔写自然生灵的生死，延续其生命感怀。寒风里休憩的雪豹，暴雪里挺拔的白桦林，黄沙中生长的绿草等，吉尔又以物自况，“我”渴望有“植物的眼睛”，阐发她对自然生命的赞美，抒发对生命短暂而时间永恒感慨，终成其“大我”天下观。

吉尔在对自我、陌生人、自然万物的叙述中，在对历史的遥念中，抒发她对新疆绿洲、对大千世界的爱。在诗集中，“自我”是诗人对身份本身进行思索，“小我”是对新疆人文的情怀，“大我”是对万物生命的博爱，三个“我”的言说铸就吉尔诗歌的交响诗。

(上接第1版)

生态文学要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当下，生态文学非常热，讨论得也比较多，但这次专门讨论生态报告文学创作话题，机会难得。”丁晓原说，此次研讨会除邀请了作家、学者外，还有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者、管理者参会，这样会让讨论更加充分。

东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峰表示，全国生态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在东台举办意义重大。东台因海而生，因海而美。这里有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有原始风貌保留完好的沿海湿地东台条子泥，成为数百万候鸟栖息、繁衍的天堂乐园。东台因海而兴。大海赋予了东台生生不息的力量，也磨砺了不惧风浪、勇立潮头的胸怀。

东台黄海森林公园中心林场党委书记崔静介绍，黄海森林前身是建于1965年的东台林场，几代林工经过56载持续奋斗，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特、从特到精”的发展之路，在贫瘠的盐碱滩涂上建成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人工平原森林。2015年成功建成了国家森林公园，实现了从“卖苗木”到“卖风景”的嬗变。变化的是人们对生态理念的认识，不变的是林场人践行绿色发展的决心。

作家李青松认为，盐城的历史进程可归结为三个字：“盐”“垦”“绿”。“盐”给盐城带来了财富，到了一定时期又“废盐兴垦”，这是因为生态发生了变化了。如今这里的“绿”让他感到惊喜。李青松从1987年开始研究和创作生态文学，他认为生态文学已经不只是文学圈的事，而且以自觉、鲜明的生态意识影响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生态文学首先的要素是自然，自然是生态文学的前提。作家在书写生态文学作品时，一定要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进行书写。生态文学作品的主题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之美。

像追寻真理一样去追求真相

作家高建国说，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强的系统性，单枪匹马推进很难奏效，要在党的领导下成系统、按体系进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高度，唤起人们的忧患和责任感。生态报告文学创作要强化问题意识，推动生态建设中一些矛盾问题的解决，要唤起全社会的关注，提升大家的道德自觉、文化自觉。

作家陈启文表示，他在为创作生态文学作品而进行的采访中，遇到很多悖论。人类在几十年前要向荒原进军，要与天斗、与地斗，把大自然作为对手、敌人，要去战胜他们。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要保护生态，这一次不是为了战胜自然，而是要保护自然。很多事情需要更深入地去追问、去思索。现在很多好的生态文学，能够从追问开始，去深入追寻真相。他说：“我们从追问开始，不一定得到终极答案，但是我们必须像追寻真理一样去追求真相。”

作家任林举认为，生态观有很多种定义，一种生态观对应着一种人的行为，也对应着一种生态文学取向。在多种生态观中，他认同和谐、系统的生态观。生态文学的写